

从《崔东壁遗书》谈史料学研究

洪波

史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展教学与研究的必备条件，人们都期望自己的教学与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特别是专人或专著史料汇编，更是给教学与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顾颉刚先生编订的《崔东壁遗书》的再版，不仅是文史哲教学与研究工作者的福音，而且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对古籍的考订与整理，尤其对开展史料学的研究，提供了具体而详实的范例，对整个学术界都将会产生影响。

崔述，字武承，号东壁，清直隶大名府大名县（今属河北省）人。生于乾隆五年（1740），卒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享年七十七岁。其父元森，治朱子之学。述年十四，即泛览群书，里人惊为奇才。年二十三，中乾隆二十七年举人。及嘉庆初，选授福建罗源、上杭知县，凡六年，多惠政。由于与时齟齬，不媚悦上官，遂告归，以毕生精力从事著述，死后留下了大量《遗书》。已故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自1921年开始搜集整理《崔东壁遗书》，至1936年由亚东图书馆印行《遗书》标点本时，历时已有十五年之久；继后，又进一步毕力搜检，至1980年病逝，虽已大体就绪，然序言尚有赖于其高足王煦华先生最后完稿。自1921年至1980年，历时四十年之久，可以说顾老也是以毕生的精力来从事于《遗书》编订工作的。这次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排再版的《遗书》，是顾颉刚先生继主持校点二十四史后对学术界所作的又一贡献。

这次由顾老重新编订再版的《遗书》，在编订上就给人以醒目的感觉，不仅总目、细目、附编、附录条理分明，而且还特地编排了八、九万字的《遗书名目索引》，名目的次序，按四角号码检字法的顺序排列，并附名目字头笔画检字和拼音检字，为熟悉不同检字法的读者提供检索方便。在某些可能引起读者疑惑的地方，顾老都一一写了按语，说明原委。特别是在《附录序目》后，顾老写有长篇按语，主要说明三个问题：

其一，说明“崔氏《自订目》及《自序》，今本《遗书》（金华府学印本）或有或无”的原委。顾氏认为：“然《自订目》实即《菽田缀语》之《薄皮茧总目》（观跋尾可知），篇中各列其未刊著述之名，致可宝贵。《自序》则缩《提要》与《附录》二书为一文，亦足以增进读者对于崔君学行全体之认识，不当弃也。”

其二，说明《遗书》的版本流传情况。顾氏云：“东壁著述，自道光以后至今日，刊本凡六（一，定州王氏《畿辅丛书》本；二，光绪初年聚珍版本；三，日本史学会本；四，上海古书流通处石印本；五，上海群学社铅印小字本；六，北平文化学社铅印大字体）。然皆出于金华府学本，无所殊异。惟嘉庆、道光之间，则其本至为分歧而其修改亦至多，崔氏则有彰德、罗源诸刻，陈氏则有南昌、太谷、北京、东阳诸刻，非悉心钩稽无以得其实。洪煊莲先生读之有年，作《版本表》一篇，先以年系书，更以书系年，而后其先后次第朗若列眉。日本

那珂先生点印此书之前曾作《考信录解题》，载于《史学杂志》。”使人对《遗书》的版本及其研究情况一目了然，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其三，纠正后人研究文录中的谬误。顾氏云：“又按：刘大绅所撰《崔东壁先生行略跋》（见传状），徐氏（波按：指徐世昌）乃认为《考信录序》，盖沿陶梁《畿辅诗传》之误也。又崔氏《自序》云：‘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刘氏文中误将‘经传’书为‘传注’，又失检矣。’”^①

类似的按语，尚有很多，限于篇幅，兹不繁举。这些按语都是顾老日积月累的心血结晶，也是顾老刻苦严谨、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顾老这次编订的《崔东壁遗书》，除照录崔东壁以考辨上古史与古代思想家孔、孟子等人生平事迹的专著《考信录》外，尚有至为广泛的内容。如：考辨古代典章制度的《王政三大典考》、《五服异同汇考》；文艺评论集《读风偶识》；与史学史、思想史、哲学史至为密切的《古文尚书辨伪》、《论语余说》、《易卦图志》；以及崔述的文集《无闻集》，诗集《知非集》，轶文遗著《大名县水道考》、《菽田剩笔残稿》等。还有崔述妻子成静兰的《二余集》（《绣余吟》、《炊余吟》），崔述妹妹崔幼兰的《针余吟稿》。顾老写有按语云：“谚有之，‘爱其人者及其屋上之乌’，今录此书毋乃类是。”^②说明其所以编录崔妻、崔妹诗文稿的缘由。同时还附编了崔述之弟崔迈的《遗书》，以及附录了后人所写的有关崔述的传状、年谱、评论。其中包括崔述的学生，当时金华府东阳知县陈履和写的《崔东壁先生行略》，以及刘大绅《崔东壁先生行略跋》、刘师培《崔述传》、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家世与年谱）；还有顾颉刚先生一行于一九三一年前往崔东壁故乡实地调查所写的《崔东壁先生故里访问记》，以及蔡元培为亚东图书馆一九三六年版《崔东壁遗书》写的题词，胡适、钱穆为亚东版《崔东壁遗书》写的序言，梁君超等众多学者在论著中有关《遗书》的评语等等。涉及文、史、哲、政、经等各个方面，总计一百五十六万字，可以说是目前有关崔述研究的搜罗最丰富、校点最精细的史料汇编了。它不仅为研究崔述的文学思想、史学思想、哲学思想以及对清代朴学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而且对如何从事史料学研究作出了至为宝贵的典范。

顾老在《崔东壁遗书》的序言中，卓有远识地提出建立新史料学的问题。顾老在总结了先人辨伪的历史后说：

可见辨伪的工作，在我国旧有学术里比较富有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优秀遗产。我们应该吸收其精华而淘汰其糟粕，宋学取其批评精神，去其空谈；清代经学取其考证法，去其墨守汉儒说；今文经学取其较早的材料，去其妖妄与迷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新史料学来。^③

顾老认为新史料学应建立在宋学、清代经学、今文经学等的基础上，这个问题当然还是值得商榷的；但顾老提出建立新史料学的问题，我认为很值得文史哲工作者一议。

第一，史料学的研究，一般人认为仅是历史学界的事，其实不然。史料学作为一种研究如何掌握史料的科学方法，不仅历史学界理所当然的要重视，而且越来越引起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教育史、科技史等教学和研究工作者的重视。在史料学的研究中，我认为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对我国传统学术中有关史料的整理、辨伪等方面比较富有科学性和民

^{①②}见新编《崔东壁遗书》（以下简称《遗书》）第911、790页

^③《崔东壁遗书序》第65页下一66页上

主性的优秀遗产应当批判地继承。二是应当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使史料学在整个科学研究中占有其独立的地位。也就是说,史料学不是科学研究的附庸,而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中国史学史、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和其他学术史一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①对史料学的研究就更为重要。中国史学史、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应建立在史料学研究的坚实基础上,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②如对孔子的研究,不仅首先要研究《论语》、先秦史书、子书,以及《史记》和后来史书中有关孔子的论述,而且对清代学者有关孔子史料的考订,特别象崔述的《洙泗考信录》这样考辨史料的史书,要做点研究,以马列主义观点对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鉴别,去伪存真,去芜存精,才能在前人对孔子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正如恩格斯所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③

第二,史料学的研究要排除门户之见,坚持实事求是,不论是汉学、宋学还是清代经学,只要其中有比较富有科学性和民主性的东西,我们都要批判地继承,吸取其精华而淘汰其糟粕。一百余年前的崔述在这方面就提出了很好的见解。他在《丰镐考信别录》卷三《洪范补说》中云:

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此不过自幼时读宋儒注日久,故厌常喜新耳。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于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但论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④

崔述自小受酷望他以理学名世的父亲的教诲,又生长在汉学披靡一世的乾、嘉年间,但他却不为世俗偏见所左右,坚持着是当论是,非当论非“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的主张,正如顾老所赞赏的“这是多么宽大的胸襟!”^⑤如对朱熹的评论就是一例。崔述认为:

矜奇者多尊汉儒而攻朱子,而不知朱子之误沿于汉人者正不少也。拘谨者则又尊朱太过,动曰“朱子安得有误!”而不知朱子未尝自以为必无误也。……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惟其不执一成之见,乃朱子所以过人之处。学者不得因一二说之未当而轻议朱子,亦不必为朱子讳其误也。”^⑥

这是多么辩证的看法。崔述研究孔子,议论古史,讨论文学,不时都有不随流俗的创见。他决不依傍门户,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评述。清代汪廷珍在读了《考信录》后,为《考信录》作序言时,就着重指出了这一点。汪廷珍说:

仆受而读之,不觉跃以起,忭而舞,曰,嗟乎,当吾世而竟有先得我心者乎!……见其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朱尝墨守旧文而不求夫心之安也;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朱尝空执虚理而不核夫事之实也。举凡仆平日所疑不能明者,无不推极至隐,得其会通。然后知先生志大而学正,识高而心细,洞然有以见古圣贤之心于千载之上而不忍使邪说波论得而淆之;其书为古今不可无之书,其功为世儒不可及之功也!^⑦

^①章学诚《校雠谁通义自序》和《校雠谁通义·焦贛误校汉志》

^②参见拙作《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史料学刍议》,载《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4期,又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1984年第12期

^③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18页

^④见《遗书》362页下。按:顾老《崔东壁遗书序》引用时,“理但论是非耳”,“是”,误作“其”

^⑤《崔东壁遗书序》63页上

^⑥《考信录提要》卷上,见《遗书》13页

^⑦见《遗书》附录923页下

欢快之情，跃然纸上；功力之深，至堪嘉叹！而最可赞赏的是崔述兼采汉学、宋学又不为所囿，既标举新意而又能做到实事求是。难怪张之洞《书目答问》把崔述列在“汉宋兼采经学家。”^①而蔡元培为亚东图书馆新印顾颉刚标点本《崔东壁遗书》题词时，就特别标榜顾颉刚传播崔述的实事求是精神。蔡元培认为，崔述作《考信录》，因其可疑者而疑之，因其可信者而信之；其实事求是之精神，则至今犹新；虽溢清代之王仲任（波按：即王充），无不可也。而顾颉刚主编《古史辨》，印辨伪丛刊，对于甄别古书的工作，几认为终身事业；今又标点《崔东壁遗书》，“并搜集一切与崔氏有关系之材料，使读其书者有知其人之乐，其足以传播崔氏实事求是之精神，更无疑矣！”^②崔述、顾颉刚这些卓有成就的学者们所走过的治学道路。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他们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精神，我们应该进一步把它发扬光大，使之万古常青！

第三，史料学的研究，也要注意文从字顺，通俗易懂。有人对考辨文章，认为佶屈聱牙，艰涩难懂，味同嚼蜡。但是读崔述的《考信录》，却是另一般天地。崔述在他的《考信录》中，却不时穿插一些俚俗故事，使人读来意味深长，饶有风味。如以“买菜求益”的故事，说明贪多无益；^③以鬻烟草必求杨氏为美的故事，说明只贵名而不求实。^④又如用苏轼宴客用他猪代金华猪，而宾客莫不称美，以贬斥那些先有成见者^⑤用陆羽品茶能辨潭水之真伪，说明只要摒弃成见，真伪并不难辨。^⑥有人别出心裁，一味信古，把七言诗的诞生託始于春秋时期，并举孔子与采桑女联句诗：“南枝窈窕北枝长，夫子行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为证。崔述诙谐地赞叹道：“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诚不料后人之后学之博之至于如是也！”^⑦真是鞭辟入里。崔述还叙述了一个甲乙两个近视眼读匾的故事。甲先使人刺得匾上之大字，乙并刺得匾上之小字。翌日，甲先以手指门曰：“大字某某”，乙亦用手指门上曰：“小字某某”。两人争执不下，延请主人出而念之。主人曰：“误则不误，但匾尚未悬，门上虚无物。不知两君所指者何也？”甲乙两人都纯属主观臆测，使人啼笑皆非。^⑧这些俚俗故事，都是围绕“辨其虚实”为主旨的。崔述的考辨文章真可谓文从字顺，妙笔生花，寓哲理于谈笑之中，平易朴实的文风，堪为后世法。

第四，史料学的研究与古籍整理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事。当前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人们迫切需要以极经济的时间来扩展无穷尽的知识，古人“皓首穷经”那一套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了。但为了使更多的人能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就必须有部分人从事古书的整理和史料学的研究。国务院成立了古籍规划整理小组，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成立了相应的古籍研究所，说明我们国家对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是非常重视的。的确，这也是迫在眉睫的事，因为随着岁月的推移，学有成就的老学者越来越少，如不赶紧培养新人，困难就会越来越大。整理古籍，首先就要碰到版本和点校的问题，顾老对《崔东壁遗书》的整理，不仅把有关《遗书》的版本问题搞得一清二楚，而且在序言中专列“标点问题”一章，这是颇有见地的。顾老说：“标点，就是古人所谓‘章句之学’。章句之学是向来给人瞧不起的，所以做这种事情

①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63页上云：“堪叹张之洞《书目答问》竟把他列在‘汉学专门经学家’，他死而有知，哪里愿意承受这一个漂亮的头衔呢！”按：经查《书目答问》，张之洞把崔述列在“汉宋兼采经学家”之目，顾氏疏误

②见《遗书》附录1042页上

③《考信录提要》卷上，见《遗书》11页下一12页上

④《考信录提要》卷上，见《遗书》10页下

⑤⑥《考信录提要》卷下，见《遗书》16页下

⑦《考信录提要》卷上，见《遗书》13页下一14页上

⑧《考信录提要》卷上，见《遗书》14页上

的人常被称为‘章句陋儒’和‘三家村学究’居于同等地位。可是我们在今日，偏须做一做陋儒，为的是希望将来的人们容易做通儒。”说明标点古书既为人所鄙视，但却又是十分重要的工作。顾老接着又说：“可是标点一事，想来容易，实做甚难。即如此书，我标点好了，大家看了一定以为很平常，觉得我只费一番读书的功夫而已。但是‘事非经过不知难’，天下的事情只有亲身做的才能知道其中的甘苦，只有从事工作的人才能知道完成一件工作的艰辛。……有时为了一个疑义，翻了三天的书仍是茫然。”^①顾老举了很多例子说明这个问题。我读到这段文字，特别感到亲切。笔者曾参与辞书的部分编写和黄宗羲遗著的部分点校工作，亲身体会到顾老所说的甘苦与艰辛。爰举二例以明之。

如日本《大汉和词典》、台湾《中文大辞典》释“寻味”一词时，引《世说新语·文学》中一段话作书证。标点为：“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田芳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中将”何解？“田芳”何义？经查核有关典籍，揣摩上下文意，乃知冯太常即冯怀，曾历太常护国将军，并未当过什么“中将”。援引者以今律古，既不明古代官职，也不懂“将”字可作介词“与”解。“中”字应连上读，作“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田芳”，乃因汉字的形似和古籍的直书，由繁体“異”字之误。作“立異义于众贤之外”，于义就通顺了。^②

又如黄宗羲《留书·卫所篇》，其中一段文字，有人点校为：“今京军不历践，更未经战阵。有名无实，当其有事，选用战兵，求一二万而不足。”据查《史记》《汉书》有关典籍，均有“卒践更，辄予平贾（价）”的记载。可知“践更”乃一个词，不能点破。“践更”是秦汉以来所实行的更赋之一。“更”字应连上读，作“今京军不历践更，未经战阵，有名无实……”，就文从字顺了。^③

以上二例所以致误，就涉及古书中文字的解诂，古今文字的变异、词语的变化，语言结构的差异以及中国古代哲学与历史知识等各方面的修养。所以《礼记·学记》述入学之序，说“一年，视离经辨志”。所谓“离经”，就是分绝经句；“辨志”，就是审辨经义的内容。所谓“分绝经句”，就是断绝文句的句读（逗），也就是作最简单的点号。“详训诂，明句读”，这是古代“小学”（即语言文字学）的基本功，也是今天研究中国文、史、哲的基本功之一。顾老无限感慨地说：“嗟夫，章句之学，通儒所鄙，然章句之士亦何可多得！韩子云：‘凡为文宜略识字。’为文而能识字，说经而能知句读，此固非易之事也。”^④如果以王安石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⑤来形容点校古籍，也是颇为恰当的。

第五，史料学的研究还要不计较个人得失，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史料学研究的内容甚为广泛，如对史料进行搜集、考订与鉴别，就要涉及目录、版本、辨伪、校勘、训诂等方面的学问；除文字记载和口碑相传的史料外，还要注意地下发掘的众多的文物史料；要运用史料，就要懂得对史料进行分类编纂；还要了解史料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流传情况。这些工作既非常具体又十分艰巨，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往往要殚精劳神，矻矻穷年，甚至要付出毕生的精力也还不能为人们所理解。崔述就是这样做的。崔述认为做学问不能“心无实得，而但抄袭先儒道学陈言以为明道，以炫世而取名”，但是“苟有所见，岂容默而不

①《崔东壁遗书序》66页上，又68页上

②详见拙作《评〈中文大辞典〉编纂中的几个问题》，载《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2期

③详见拙作《黄宗羲〈留书〉点校补遗勘误》，载《文献》1986年第4期

④《崔东壁遗书序》67页下

⑤王安石《题张司业诗》

言”。^①他对明季以来，学者专尚时文、词章之学，或以道学自命，述宋儒性理之剩说，而不专心作“殚精经义，留心治术，为有用之学者”^②的现象深表不满。他自己则以实际行动终生“博极群书，不为空谈无补之学”。^③《遗书》就是他积毕生精力写成的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和史料学研究价值的著作，而崔述自己却谦称为“薄皮茧”。“薄皮茧”者，“遂谓之有所成而琐琐不足道”者也。他无限感慨地说：

世之论者皆谓经济所以显名于当时，著述所以传名于后世。余之意窃以为不然。人惟胸有所见，茹之而不能茹，故不得已假纸笔以抒之；犹蚕食叶既老，丝在腹中，欲不吐之而不能耳。名不名，非所计也。谓之为“薄皮茧”，称其实矣。^④

崔述自认为自己只是象老蚕吐丝一样“欲不吐之而不能”，从而发为文章，并不计较著述的传与不传。著述也不是为了扬名于后世，“名不名，非所计也。”这充分表达了崔述高尚的思想情操，就是在今天也是值得称颂的。

顾颉刚先生也曾说过：“凡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必须由于长期的努力，一个人的生命不过数十寒暑，固然可以有伟大的创获，但必不能有全部的成功。所以我们只能把自己看作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必须比前人进一步；也容许后一世的人更比自己进一步。能够这样，学术界才可有继续前进的希望。”^⑤在有关学术的辨伪史上，崔述是一个阶段，比前人进了一步；顾颉刚也是一个阶段，他比崔述又进了一步；顾老还期望后来的人继续前进。崔述、顾颉刚这些前辈学者，为了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把毕生的心血注之于楮墨，不为名，不为利，顽强地奋斗了一生，这是多么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啊！怎能不令我们敬而仰之呢！

为了更好地开展对古籍的整理和史料学的研究以有利于教学和科研的进行，我们期望有更多的象《崔东壁遗书》这样将有关史料集成帙的专著出版。^⑥

①《考信录提要自序》，《见遗书》1页

②《考信录提要》卷下，见《遗书》16页

③徐世昌《畿辅书徵·崔述》，见《遗书》附录915页上

④崔述《自让全书目录跋》，见《遗书》附录914页上

⑤《古史辨》第三册自序

⑥有关《崔东壁遗书》的评价，参见拙作《论崔述及其〈遗书〉》，载《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1期

（上接第130页）

讲，出席会议，走访学校、工厂、农场，慰问受伤战士等等。因此，1941年1月10日，《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发表的《论今年的妇女运动》一文中说：“全国二百多个妇女团体，大多数都能团结在蒋夫人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周围同心协力地开展合作。”罗斯福总统夫人于首次访晤蒋夫人后，曾对记者称道：夫人之刚毅与愉快性格，蔼然可亲，实予人以深刻之印象。其后又于《我之一日》专栏中，撰文称：“吾人之欢迎蒋夫人，非以其为蒋委员长之夫人而欢迎之，乃以其为对战时工作有伟大之贡献，且为世界杰出妇女领袖及政治家

而欢迎之”。^①

由于抗战建国的共同要求，使得国共两党的妇女界人士以及无党派爱国民主妇女，能够在组织中共同战斗，然而由于各阶级各阶层的妇女群众对于抗战建国的不同态度，对于妇女解放的不同理解，新运妇指会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组织之中，摩擦、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皖南事变前后，由于国民党加紧反共摩擦，进步势力大批退出“妇指会”妇指会在妇女界的影响日益削弱。

①张曼光：《蒋宋美龄女士传略》